

“舅”俗新改,长江口先开

□王鸢神

现代放言

有句歇后语,叫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(旧),今天就聊聊“舅”俗。

长江口的崇启海,即上海市崇明区,江苏省启东市、南通市海门区,是长三角的“铁三角”。历史上,三地长期隶属于江苏,地缘亲近,文化同根,风俗同源,方言同流,同中有异,各具特色。崇明成陆时,一度是古海门的领地,清代新海门沙地复涨后,垦荒移民主要来自崇明。海门下沙和崇明外沙,是今天的启东版图。崇明和启海南部流行沙地方言和民俗,启海北部一度划为南通东乡,土著“江北人”又叫通东人,通行通东方言与习俗。

江北大和沙地都敬重舅舅。江北的舅舅,沙地叫娘舅,也叫“娘舅爷爷”。俗话说,娘亲舅大。舅舅是母亲的兄弟,代表嫁出去女儿的娘家势力,是约定俗成的母权保护人。舅舅是父亲的妻兄弟,书面语内兄内弟或姻兄姻弟,口语江北叫舅子,沙地叫阿舅。姐夫或妹婿与舅子的关系,江北姊舅沙地妻舅。旧时女性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,要是在夫家被严重虐待,受到莫大委屈,“泼出去的水”无端被泼了脏水,

舅子都会兴师问罪,给姐(妹)夫施加压力,为姐(妹)讨回公道,即使借题发挥“作威作福”也无人干预。既要维护夫权又不能任性,从风俗层面授予娘家监察权,矛盾冲突不惊官动府,由老娘舅摆平,是古人的变通智慧。分家析产、遗产继承、子嗣过继等涉及经济利益的家事,老娘舅即使不主事,也会到场见证。现在不少地方把民事调解员尊称为“老娘舅”“老舅妈”,赋予“舅”俗新的生命力。上海滑稽戏里,李九松终身演“老娘舅”,得益于他出生在海门农村,生活积累对角色把握的贡献。

法治社会给了女性依法维权的尊严,“老娘舅”出场摆平之事已不多见,但在民间活动场合,舅舅的“首位度”并未降低。通东地区凡是有喜事,诸如砌房子送糕(高,沙地叫搀高头)、吃面祝寿、寻新妇吃喜酒……登号时,舅舅按年龄排序从一号登起。如果晚到,就按应到户数从一号起空余若干号。布置厅堂,舅家的喜轴、贺联挂在大厅正中位居中堂。开宴,舅舅坐主桌首席(方桌坐东北角)。

家有白事,先去舅舅家报丧。舅家上门吊唁,外甥男女披麻戴孝哭到进宅大路口远迎,向来宾逐一屈膝行半跪大礼。料理母亲丧事,舅舅对方案有异议,通常照办,不得改舅舅的“话”。

俗话说,外甥不出舅家门,既有母系基因强势的因素,又有外甥常登舅家门,舅舅潜移默化影响。外甥与娘舅长得像、举止像、腔调像、性格脾气像,使舅甥感情天然亲和。年龄悬殊,情同父子。差距不大,父子加兄弟。舅父相当于半个父亲,心甘情愿给了外甥额外的父爱。舅父的爱和父亲的爱有本质区别,不是必须的,却是必要的;不是强制的,而是自愿的;不是刚性的,而是灵活的。父亲抚养子女有天职,子女赡养父亲是法定义务,但外甥对于舅父之爱,只需常怀感恩之心,报以持久关心,一般不必以赡养来回报。有的外甥父亲体弱多病乃至英年早逝,舅父无私之爱远超生身父亲,堪称再生之父,也不会生出投靠外甥养老的“非分之想”。

“外甥大老爷(yī)”(注:通东方言读音)有点夸张,却是外甥在舅舅按年龄排序从一号登起。如果晚到,舅舅是助长的首席外甥。外甥有出息,舅舅比他的亲生儿女出人头地还骄傲。外甥不争气,舅舅比他亲爹还要内疚,打轻骂重都是爱。在舅舅的“岗位职责”里,对外甥负责,也是替出嫁的姐姐或妹妹尽力,子女早点有出头之日,老姐妹晚年才能多一分保障。若把嫁出去的女子比作一台汽车,舅舅就是生产厂家终身免费售后服务的“特派员”。

外甥的舅舅,也是舅舅的外甥,日后“提拔”为舅舅的舅舅——舅爷爷、舅公,连舅三代,最知任担一角都不易,两全其美更为难。

“娘舅娘舅,说话急吼吼,跑路慢拖拖。抽烟像放火,吃酒像漏斗。”这首沙地风格的童谣,漫画出一个不良舅舅。舅舅的民间影响力大于官方的专家,舅舅对外甥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,不亚于父母。好舅舅是外甥的偶像,坏舅舅是外甥的魔障。舅舅的人格魅力是外甥的成长钙片,舅舅的昭昭劣迹是外甥的免疫漏洞。舅舅强大,外甥雄健。舅舅熊,外甥怂。

舅舅和外甥的品质,影响社会细胞质量,波及国民素质。天下舅舅,个个散装。

舅舅如此重要,从无资质认证,从无准入门槛,从无职业教育,也无交流平台。舅舅不合格,无人引“舅”辞职的自罚,也无“舅地”免职的惩戒。趁着一年之计在于春,以“铁三角”为实验基地,改良“舅”俗,创新机制。建立崇启海舅舅(99)联盟,分设老娘舅江北俱乐部、老娘舅沙地沙龙,线上不断线,线下有交流。每年开次舅代会,摆个舅职演讲擂台,推举舅人新事,评奖年佳十舅,为杰出人物颁发终身“舅”奖……

长江口铁三角有能力向长三角输送社科软实力,贡献“夹沙江”舅甥互励宝典……

芦苇收割记

□龙水

芦苇,则当作燃料。

我自从小就目睹羸弱的母亲下河割芦苇,下到河里,挥起镰刀的她,俨然是一个精壮的汉子,收割、拉动、捆扎等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十七八岁起,我开始下河割起了芦苇,由于不得要领,每次收割芦苇后,人累得散了架不算,手脚还常常“挂花”。在母亲手把手的示范下,几年后,我割芦苇的手艺大有进展,原先割的芦根参差不齐,现在割后的芦根齐刷刷一片。

多年后,母亲过世,我和妻子接过了母亲的责任田和每年的割芦苇活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曾经是个宝的芦苇已黯然谢幕,芦苇仿佛也成了农村里多余的一种植物。为此,一些农家任芦苇自生自灭,还有的人家则将其付之一炬。而恋旧的我,平时又有烧土灶的习惯,尽管每年收割芦苇累得要命,但雷打不动。

贤惠能干的妻子经过多年观察琢磨,今年特意将芦苇收割的时间,生生地延迟到几个月后的开春之后。曾有一次,我追着她问:今

年的芦苇还收不收啦?可她言之凿凿:放在秋冬收割,泡在水里的芦苇粗壮叶茂且水分多,因而吃力。而开春之后,经过日晒雨淋的芦苇水分蒸发,叶片芦花早已被吹落,剩下的几乎是光秃秃的秆子,收割起来易如反掌。尤其这个时候,割芦苇正有利于地下萌动着的芦苇发芽生长。妻子的一番话,令我茅塞顿开。

“嚓嚓”声、“啪啪”声,仿佛是一曲美妙的音乐,令我俩你追我赶。伴随着芦苇残叶的簌簌掉落,踩在水边上的我汗如雨下,一捧捧芦苇被我们割下,又被我们一捧捧抱上岸上。收割完后,我们又马不停蹄,将一个个芦苇打捆,运回家中,放在柴禾堆里。

看着两侧的河边被我们拾掇一新,蚕豆、油菜争相露出笑脸;看着被我们打理过的小河流水潺潺、清澈明亮,我的心情无比激动,所有的疲惫也烟消云散。于我而言,更重要的是,每年的收割芦苇,不仅是对身体的锤炼,意志的磨砺,更重要的是对勤劳朴实,平凡得如同芦苇一般的母亲的最好纪念。



是春韭炒螺蛳肉。俗话说“春分韭,清明螺。”这说明螺蛳也是时令性比较强的食材。清明时节,家乡沟河里的螺蛳是最肥美最可口的,所以说,当“春分韭”遇上“清明螺”,那才是真正的绝配。韭菜的另一食途是作馅和佐料,韭菜与鲜肉剁成泥,包饺子、包子、春卷,原为北方代表性美食,现通吃南北。韭菜切细,调入面糊摊成韭菜饼,焕发出来的气息,那真叫“香喷喷,啧啧香”!

春韭已剪了3000多年,《诗经》里就记载有“献羔祭韭”的字句,如今这“流落”民间的蔬菜,当时还登过大雅之堂,是祭祀时神仙才能享用的,属于上等蔬菜。到了西汉,韭菜便开始普及起来。黄门

麒麟镇杂忆

□陈汉忠



麒麟镇老街 施永摄

这是一座极普通的乡间小镇,街宽不足十米,街面中间铺着长条青石,两旁店铺清一色木质排门。街道上从早到晚人群熙熙攘攘,偶尔有供销社往乡下代销店送货的拖车,在高低不平的石街上驶过,发出阵阵玻璃器皿摩擦的声响。还有西桥头终日冒着白色蒸汽的老虎灶,门口永远有一长溜排着队的竹壳暖瓶。

这就是麒麟镇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
据海门县志记载,麒麟镇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(1777年),距今已有230多年历史,这里原是冲积平原形成的一片沙地,史称“东洪沙”。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,麒麟镇几经沉浮,历尽沧桑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小镇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店面勉强支撑。最难让人忘怀的是1948年中秋之夜的大石桥阻击战。在解放麒麟镇时,遭到四甲之敌增援,我阻击部队死守海界河的大石桥,在桥面、水上和敌人拼起了刺刀,敌人丢下了许多尸体却未能突破我军防线。我军也有数十位烈士为解放麒麟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他们的名字永远被麒麟人铭记。

麒麟镇的悲壮往事,让我对这座小镇肃然起敬。

在我的记忆中,麒麟镇菜市场紧靠畜牧场河。河约有二十米宽,既是宅沟,也是镇上人生活的取水点。麒麟镇的菜市场是露天的,分东西两块,东边卖活禽和家畜,还有竹木器和乡下人晒东西的芦席和筴箬簸箕等。市场西半边,乡下人把自家种的蔬菜和黄豆、花生米之类的干货拎到集上,摊回油盐酱醋之类的物品。蔬菜摊北边有座被海门人称为“达子”的地方,那是买卖鱼虾之类水产品的。因为鱼虾相对蔬菜要贵重,市管部门派专人在“达子”司秤,俗称“主人家”。围着“达子”,人们讨价还价,成了早市上最热闹的一道风景。

畜牧场河被麒麟镇人视作母亲河,岸堤不高,铺有六七级石阶,河面上架了座米把宽、三米开外长的栈桥。栈桥略高于水面,桥面由一块块木条拼接而成。小河仿佛专为麒麟镇人而存在,它宽阔处长约一两百米,由西往东,紧贴小镇居民区,然后绕了个弯,流向东南方的头匡河,浩浩荡荡奔长江去了。

岁月冲淡了往事,许多关于小镇的画面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已是支离破碎。唯有对小河的记忆依然清晰,晨雾间洗菜淘米的大叔大妈,春雨中戴着草帽的钓鱼汉子。对了,还有光着膀子肩上搭条毛巾的小河挑夫的身影。

挑夫姓汪,是麒麟镇的原住民,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,只知道镇上年轻人喊他汪叔,年长点的称他老汪。那时镇上还没有通自来水,饭店和食堂都备有几口大缸,雇请汪叔挑水。小镇人多,天一亮,小河栈桥上就挤满了人,淘米的,洗菜的,漂洗衣物的。为了躲避用水高峰,汪叔大概是麒麟镇起床最早的人。他个头不高,皮肤黝黑,常年挑水劳作,肌肉很是发达。夏日里,他常常光着膀子,肩上架一条毛巾。两只刷了桐油的圆形木桶,一根黄中泛白的桑木扁担,是他赖以生计的全部家什。这满满两桶水有百十斤重,只见他双肩一挺,借着木桶的浮力,“哎哟”一声,栈桥一阵轻微晃动,汪叔已立起身子,迈开大步,连跨几个石阶迈上岸堤。

紧接着响起一串号子声——“嗨嗨嗨哇! 嗨佐哇哎嗨喂!”木桶上下跳跃,水却没有溅出来,与他的脚步配于一体。

春韭的香,是时令的安排,是长期潜伏熬心费力的结果。没有“熬”的过程,人生的况味如何醇美香浓,如同生活中的那些波澜曲折,往往后来成为一种能量和养分,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生命。

合得恰到好处。他披星戴月,双肩扛起的不仅是水桶,更是全家人生活的重担。他在艰辛的劳作中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挑水技巧,那是他的睿智和精明。

麒麟镇老街的主街在中间,东西走向,不足两百米的街道上,商铺鳞次栉比,没有一户居民住宅。东西两侧的副街,合起来比主街长不少,没有一家店铺,密密麻麻挤满了住户。街道上成天飘着煤炉燃烧时的气味。入夜后,主街店铺纷纷打烊,只有旅馆门口挂着两盏昏黄的马灯,偶有行人匆匆而过,不过此时的副街开始热闹起来。夜色中,家家户户炒菜做饭,街面上飘着饭菜的香味儿。要是夏日,家家户户都把饭桌抬至街心,一桌接一桌,从西往东,一溜摆开几十桌,欢声笑语在大街小巷荡漾着。

小镇人对生活充满乐观,遇到难处,也总是想方设法自我寻思解决。小镇东首有个名叫樊发膝的中年汉子,有点文化,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但体弱多病,干不了农活。他找了几块旧木板钉了个小方桌,往主街邮电局门口一摆,桌上竖一小牌子,上面写着“代笔家书”。那时乡亲们大多不识字,更别说写信了。樊发膝很有毅力,不管天冷天热,刮风下雨,一天不拉。我常常看到他与访客促膝交谈,随后挥笔疾书,一封家书就成了。至于报酬嘛,也没明码标价,三角五角不少,块儿八角不多;遇上有难处的,义务劳动也是家常便饭。但乡亲们也知他的难处,今天没给代笔费,明天准给你带几穗乡下自家田里长的玉米棒子,或十个八个自家老母鸡下的蛋。就凭这,病殃殃的他不仅养活了自己,还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麒麟镇迎来了一批陌生的面孔,他们拖儿带女,拎着被子铺盖,搬进镇上大街小巷那些提前腾空了的旧屋里。新居民来自距麒麟镇五六里地的一个叫长春镇的地方,那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,政府兴修水利开掘海启河。虽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家园,但兴修水利是党的号召,长春镇人义无反顾地告别家园,有的投亲靠友,有的租房,还有的远涉他处。

搬迁麒麟镇的新住民虽然大都住在副街上,但几乎全是农村户口。当地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,好在这群新住民勤劳且手巧,没有坐等政府救济,而是八仙过海,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。想想这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,但我却记忆犹新。东街朝北屋的明青伯有一手宰羊杀猪的手艺,他顺势而为,在后院支起锅台,办起了屠宰场;汪家弟兄有祖传的医术,于是汪纪平小门诊应运而生;明青伯对门的倪锦如夫妇,还有西街南巷的孙振东、赵启达琢磨着开了缝衣店。

我离开麒麟镇四十多年了,麒麟镇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:先是菜市场搬走了,后来供销社的商店关门了,接着两家饭店歇业了。再后来,老街上的青石板路被铺成了水泥路。早些年回去,偶尔还能在街上碰见挑水的汪叔等麒麟镇老人,后来就渐渐难得见到了。环绕畜牧场的那条河也干涸了,只有西侧低洼的菜地,还依稀可见当年小河的痕迹。我知道,几时的麒麟镇已经远去,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新行渐远的背影。但小河边那些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麒麟镇人是我永远的乡亲,有了他们,才有了麒麟镇的昨天和今天。当然,明天也一定属于他们,因为在他们微小身影的背后,是一个民族的伟岸灵魂!



韭菜的生长类似于麦子,它们都在泥土下憋着劲、积蓄着力量,